

陇上学人文存

初世宾 卷

初世宾 著 李勇锋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 初世宾卷 / 范鹏总主编; 初世宾著;
李勇锋编选.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226-04788-0

I. ①陇… II. ①范… ②初… ③李…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简(考古)—中国—文集 IV. ①C53
②K87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108294 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张 菁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初世宾卷

范鹏 总主编

初世宾 著 李勇锋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4.25 插页 9 字数 357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978-7-226-04788-0 定价: 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陇上学人文存》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陆 浩	刘伟平		
主 任：	励小捷	咸 辉		
副 主 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	连辑	咸辉		
副主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鹏	
委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主编: 范鹏
副总主编: 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任：	连 辑	张广智		
副主任：	张建昌	范 鹏	马成洋	
委员：	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王福生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四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 任:	连 辑	夏红民		
副 主 任:	张建昌	范 鹏	高志凌	
委 员:	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珪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 范 鹏

副总主编: 王福生 马廷旭

总 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代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直词审实 披沙拣金

——《陇上学人文存·初世宾卷》编选前言

李勇锋

20 世纪是中国史学发展最显著、变革最深刻的时期。究其内里，无不由大家硕彦顺应新时代、新史观、新史料、新方法、新的学术文化氛围等等所融汇造就。甘肃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和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资源宝库，20 世纪中国四大考古发现中的半壁江山——简牍文书与敦煌文书即钩求于河西走廊与古居延地区，自此以后，甘肃以不断的重大考古发现而著称于世。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既见证了甘肃古代辉煌的历史，也有力推动了新的学术文化繁荣发展。在甘肃文博系统奉献半个世纪的初世宾先生，既是这一伟大历程的亲历、见证者，也是这些沙海故珍的研究、发凡者。

先生原名初世民，或又作仕宾、师宾等。1937 年七七事变之秋，生于山东烟台一个诗礼商宦之家。少小遭罹战乱，然不废学业，在烟台近代废私塾、兴学堂后兴办的第一所学校——养正小学（养正义学堂）和山东省重点中学烟台一中（芝罘中学）受到良好的启蒙基础教育。1957 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本科，修业四年，亲受陈同燮、郑鹤声、黄云眉、童书业、张维华、王仲荦、韩连琪、陈云章、孙思白诸辈名师教谕，启益良深。1961 年 7 月以优异成绩毕业，志愿赴西北，克服长期两地分居等许多特殊困难而在甘肃留居下来，先后在甘肃省考古所、甘肃省博物馆从事文物考古发掘、学术研究、展示教育和保护管理工作。



由于青年时代打下的坚实史学根基，世宾先生在他漫长的文博事业生涯中，能够遍访河陇、学游天下，系统爬梳、挖掘甘肃独特的石窟、简牍、丝绸之路等文化遗产价值，从秦汉西北史地研究入手，敏锐发现学术热点，善于稽古发微，直词审实地还原历史，揭橥其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披沙拣金、所获至巨，并不断开辟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因之形成了三个研究重点，即考古学研究、丝绸之路学研究和简牍学研究，并在其余众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他的著述风格，总体上更加倾向于或擅长以文化史、社会史贯通的方式，在简牍、考古资料中发现和穷举问题，尽可能详尽地复原历史，或者阐明它在重要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意义。

一、 考古学研究

考古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相较于传统学术路径，它是理论实践结合更为紧密的新学问。另外，考古工作除了直接服务于历史研究，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同时要开展文物保护。1961~1985年，世宾先生在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今省考古所）工作，及任副队长职。作为甘肃考古队伍的中坚力量，在长达25年的考古研究生涯中，他几乎踏遍河陇大地，参与和主持了多项重大考古发掘工作，在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收获。还多次组织举办全省文博专干学习班，亲自编订讲义、现身说法，为全省各地快速培训了一批急需人员，也使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上升到新的层次。

继1950年冯国瑞和1952年中央文化部、西北文化部组织的两次考察后，1963年，世宾先生参加了甘肃省文化局组织的炳灵寺石窟第三次6人考古调查活动，勇攀自明中叶以来数百年几乎无人登临的169窟，首先发现西秦造像、壁画、题记（建弘元年，420年），使炳灵寺石窟创建上限由原先发现的北魏时期（延昌二年，513年，曹

子元造窟题记)前推百余年到十六国时期,也为全国早期石窟获得断代标准。1966年,在“破四旧”的凶险关头,世宾先生毅然与同事一起赴京反映真相,争取国务院二次下文飭修炳灵寺挡水坝;并代表甘肃省文化局作为“炳灵寺石窟保护工程”指挥部甲方代表和文物遗迹抢救清理搬迁负责人,组织各方面文物技术力量,在水库蓄水前完成了窟前遗址发掘和塑像壁画的抢救搬迁工作,将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

1972年,世宾先生主持了灵台白草坡西周墓群和车马坑的发掘,获取了丰富的遗物,许多发现和分析属国内首例。特别是在甘肃考古史上首次发现车马坑并完整发掘(1974年又成功主持平凉四十里铺战国墓车马的发掘,标志着甘肃省田野发掘水平已臻成熟)。在由他执笔撰写的《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报告中,结合车马构造,印证了古代贵族“贰轂贰辂”的舆服制度,并判明1、2号墓的主人为西周康王时期分封的殷商贵族的濞伯、陟伯,表明西周初年政权更替过程中与殷商旧势力的合作不仅有分封武庚治殷的孤例,也证明了西周等级制中濞伯、陟伯此类的伯,是军事将领,拥握重兵特权,镇抚一方,可分封也可迁移,维护全国专制统治。之前一度认为西周国家形式粗陋,毫无行政系统可言,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79年,世宾先生还带领考古队对嘉峪关黑山岩画进行了首次全面考古勘察。这次考察历时2个月,共发现153处岩画,除早期游牧民族狩猎生活画面外,还发现了历史时期的宗教题材岩画,有佛塔、佛像、佛教标志符号和藏文题记,使嘉峪关岩画的内容从史前时期延续到历史时期,使其价值内涵得到极大拓展。

雷台东汉墓因出土后定为中国旅游标志的“铜奔马”而著名,但这些珍贵文物因早年被盗和自然损坏,其实际数量和仪仗原貌已经缺损扰乱,致使一些重要问题诸如墓主人、等级制度和铜奔马的意涵等一直众说纷纭。在《雷台东汉墓的车马组合和墓主人初探》一文,他



依据《后汉书·舆服志》的车马舆服制度和一些同期壁画墓车马出行图的典型实例,综合考虑了礼制、葬仪和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因素,对相邻历史时期众多当地王公贵族和高官大吏进行逐一对照,认为汉末曹操的将军武威郡祖厉人张绣是最有可能的人选。这一推论,充分综合了地下文物与地上史料的有效信息,在各种假说中最有说服力。雷台铜奔马问世后,最初称“马踏飞燕”,后经世宾先生改订为“奔马”。但后来,他又认为此马的步法为同侧二足一齐进退,两侧交替,驯马术称之为“对侧步”,称“奔”不甚确切。结合形象特征和随葬实况等,重新主张此马为代表墓主人生前珍爱的“狩猎之骑”。马蹄下的飞鸟应该是鸱隼类的猎禽,整个造型体现的是一个走马飞鹰的狩猎场面;而仪仗中那匹“兔头凤颈”,长肢伟躯的主骑——墓主人的坐骑,应是西域大宛传来的汗血天马。为此,作者广泛征引了宋人《艾子杂说》、张衡《西京赋》、夏侯湛《猎兔赋》、曹毗《马射赋》等众多文史材料,参证嘉峪关壁画墓的相关情景画面,力证这一假说,有力地反驳了“天驷”、“袭乌”等说,以及“马超龙雀”等推论,更贴近真实,体现了他治学的严谨和学养的深邃广博。尽管这一“猎骑”说,至今远不如奔马和马踏飞燕等名称家喻户晓,并且社会对后者更感兴趣,但这种自我革命、自我否定、不媚时俗的求真精神确属难能可贵。

甘肃素有石窟艺术之乡美誉,石窟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时代悠久,艺术价值极高。按照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的分类,甘肃石窟主要属于中原北方地区的河西区与甘宁黄河以东区;按照社会相沿已久的中国四大石窟、六大石窟的说法,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均可雄踞半壁江山。但是由于石窟寺摩崖凿穴的造型独特性以及价值内涵极为丰富,使得石窟寺考古在遵循或参照一般考古理论和规律,研究其历史脉络艺术流变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其在特定立体空间的规划布局问题。世宾先生在长期的考古研

究生涯中,因工作之便和步履之勤,得以从时间、空间两个方面,系统观察和比较佛教艺术东渐和中国化的佛教艺术反溯西被的两种奇妙历程,与甘肃、国内外学界同仁一起,在史岩、町田甲一等前辈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共同掀起绳墨中国石窟寺断代编年的新高潮。他本人还以中国石窟中造型、借景最为奇伟高妙的麦积山石窟为切入点,突破当时主流的艺术考古方法,全面运用系统方法,独树一帜又融会贯通,写下了《石窟外貌与石窟研究之关系》和《麦积山的开创年代与相关问题》两篇长文,在宏观的甘肃石窟和具体的麦积山石窟开凿创始年代与发展演变方面做出系统的探索。

早在1964年撰写的《石窟外貌与石窟研究之关系》一文中,他即全面比较了窟内窟外的环境、相邻洞窟的关系、洞窟开凿留下的不同层次和痕迹,并对麦积山有关地震崖崩和灭法受损两大客观因素进行分析之后,通过造像题材、风格、样式和衣饰演变的广泛比较,对相应洞窟的开凿年代、创传过程和承袭影响——作了新的考订。本文未以传统治学的文献考证和考古勘探入手,而是独辟蹊径,将论者化身麦积山石窟的设计者和开凿者,首先静观麦积山的“崖面使用”,结合现有的“洞窟布局”,融入式地审视麦积山石窟应有的合理布局与科学规划,再以“时代层次”为时间轴,通过崖面崩塌、洞窟打破、侵扰改做等痕迹,结合前人对艺术风格演变的探索和结论,分组、分层、分区域、分时代,实事求是地一一讨论了麦积山石窟相关洞窟的断代和相互关系问题。先生在该文的副标题中将之谦称为“石窟寺艺术断代的一种辅助方法”,但显然这种所谓“辅助方法”要比其他通过单一、片面方法得出的结论更令读者信服。

如果说上文体现了世宾先生学术研究中的“独具匠心”,《麦积山的开创年代与相关问题》一文则展示了他“通古今之变”的史家学养。该文认为,自汉魏以降,凉州兼领西域都护、校尉,河陇地区汉戎共



处,在政治、文化、民族、交通上,甘肃占据佛教文化自印度传入西域新疆区而后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的主要路线,并中西交往中有近水楼台之便。他提出,根据甘肃石窟的形成、发展历史、特征,由西向东,可分为走廊西部的敦煌区系,走廊东部的金塔寺、天梯山区系,甘肃中部的炳灵寺区系,陇南、渭河流域的麦积山区系,陇东、泾河流域以泾川王母宫为代表的陇东区系等 5 大区系。并且言明,佛教的中国化从国土范围而言,于阗、龟兹之变化为开始,至十六国到云冈始完成。以上甘肃 5 区系属于佛教艺术中国化的第一阶段(或别于龟兹、于阗样式等小变之大变),各有特定的地域环境、政治背景,除陇东一系为北魏统一以后受平城、洛阳二京影响之作,其余均产生于前述十六国佛教东进之浪潮中,时代均应早于云冈,也都发现了十六国时期窟龕及相关文献记载与历代相继造凿的窟像,遗迹文物与历史资料极丰富,应该说毋庸置疑。

世宾先生进一步总结了这一时期甘肃以秦凉为中心的佛教艺术博采众长、争奇斗妍而又统一于初步中国化的过程特点,特别重视因后秦灭亡(417 年),关陇战乱,佛教中心、僧伽力量等向西的一次大迁移。指出,“佛教文化艺术由此而得到了更进一步传播,新的集结和重组,促使其不断统一,提高水平”。他进而认为,十六国时期佛教艺术发展终结于昙曜五窟的开凿,即云冈一期。最终亮明了“前秦、后秦、西秦等自关中—秦州—河州—凉州—平城”的传播脉络,而非习见的“云冈——麦积”论,值得引起更大关注。关于对云冈一期的认识,先生在该文前段梳理后秦、西秦、北凉石窟之间的渊源、影响等亲疏关系时,强调除了宗教、艺术的原因,还要考虑政治因素和时代风尚的总趋势;在此处,他提出北魏当时乍看有皇帝率先垂范,王公贵族竞相效仿而貌似举国崇佛的形势,其实它的高僧、工匠都是“军事拿来主义”,上层社会所崇礼的“佛法旨趣并非正轨”,常走极端,其佛